

「晚明風雅領袖王弇州在東亞」 學術座談會報導

黃祖恩*

日期：2022年8月20日（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實體、視訊）

主辦單位：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中央研究院「東亞文化意象的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主題計畫

本次座談會由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及中央研究院「東亞文化意象的博物書寫與物質文化」主題計畫共同舉辦。在開幕式上，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呂妙芬介紹此次座談會的源起，以及說明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所策劃王世貞展覽的合作經緯。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接續說明此次以王世貞（1526-1590）為核心的座談會，將探討王世貞對東亞研究在明代文學、道教、書法、收藏等面向的影響，也非常高興能與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合作。本次座談會共八位學者發表，以下依照發表順序，記錄發表主題與內容。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Email: keloloman@gmail.com。

一、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廖肇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鄭利華（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論 題：王世貞與七子派詩學的調協及變向

復旦大學古籍所鄭利華教授長期致力於明代文學研究，並著有《王世貞研究》、《王世貞年譜》及《前後七子研究》等專書。鄭教授在專題演講中首先提及，王世貞雖然在學界廣為人知，但相關研究多因襲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學、批評史論調，貶低王世貞等人的復古思想，然而其中如復古派的崛起、復古的動因等問題，仍有許多研究空間。鄭教授從明初將重視經典落實於科舉的考試政策，導致士人對古文辭興趣缺缺的背景談起，將前七子於史學、古文辭的復古實踐，定義為當時的知識革命。至後七子時代，情況更為特殊，如王世貞以自身龐大的著述成果，扭轉當代的知識風尚。鄭教授也指出，以往過度在意前後七子的復古共相，較少關注彼此的差異，此次演講即欲以王世貞的復古思想為核心，比較復古派的思想差異。

鄭教授首先以「模擬之妙」為題，說明明代復古派在趨向法度的同時，強調自然運用的藝術之境。王廷相（1474-1544）強調古典文本法度，從中體認法度之要；李夢陽（1472-1529）與何景明（1483-1521）爭論言與法度的差異，兩者的交鋒蘊含於模擬、變化中構建張力、制約，尋求古典規矩，並以此基礎追求變化。王世貞則強調模擬的工夫以及自然的體現，他透過「模擬之妙」建立模擬本身的合理性論述，以模仿為基礎，最終擺脫仿擬，達至無跡。因此，王世貞特別強調作為特定規則，且具有針對性、不可替代性的法度，在詩文創作中的必要性。在王世貞的思想中，法度並非後設，而是已蘊藏於古典文本中。他從被人們視為能夠體現自然的《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等作品中，尋找那無創作痕跡的法度。就文學創作而言，王世貞在自然中尋找法度，是為揭示一條由模擬、體認法度為始，並以不著跡之方式得入妙境的創作途徑。王世貞對模擬與無跡的推崇，也體現於對三謝的高度評價，他認為

三人都透過琢磨而入妙自然，琢磨成為形成自然風格的途徑。

再者，王世貞以周密而嚴謹的詩法聞名。相較李、何尚未建置全面的法度系統，王世貞十分重視詩的細微法度，如文學體制的規定以及詩的轉結、韻、句法等，並規範不同詩體的具體作法。王世貞對於法度的高度要求，甚至在面對復古派推崇的《詩經》時，仍然挑剔《詩經》中的句法簡陋、錯誤之處；而普遍被認為構句嚴密的杜甫（712-770）絕句〈日出籬東水〉，他也不認同此詩為五言絕句詩法之冠。

最後，鄭教授以精雅意識與理性化審美範式的標立，點出王世貞詩學的特色。王世貞特別強調中原與他地詩法的差異，認為李夢陽、康海（1475-1540）之所以不能詮釋中原粗疏之氣，源於二人對詩歌精思的偏好，反對粗疏、粗豪。而與「精」關聯的「雅」，一直都是後七子的論述重點，如謝榛（1495-1575）強調變俗為「雅」，李攀龍（1514-1570）推崇雅正而避免俚俗，王世貞則關注「雅」如何婉曲地表現「發情止性」的道德義理，鑽研格調如何調解情緒表現，以合乎節制以及規則。

二、第一場

主持人：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林宜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論 題：蘇州文化史中的王世貞：王世貞與晚明任誕士風

與談人：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賀晏然（東南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論 題：王世貞與晚明文人道教的展開

與談人：賴思妤（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此場以王世貞對當代士風與宗教的影響為主題。林宜蓉教授以王世貞《藝苑卮言》為晚明任誕書寫的重要文本，剖析王世貞的生平與書中任誕、狂士書寫的關係。《藝苑卮言》的寫作，自王世貞三十二歲（1557）始、四十歲（1565）六卷本成，至四十七歲（1562）增至八卷、附錄四卷。嘉靖三十四年

(1555)，楊繼盛(1516-1555)案爆發，此事不僅扭轉了王世貞的家族氣運，也成為他長期撰作《藝苑卮言》的重要背景。此年，不受嚴嵩父子(嚴嵩，1480-1567；嚴世蕃，1513-1565)攏絡的王家父子，為彈劾嚴嵩的楊繼盛起草、殮棺，世貞之父王忬(1507-1560)更因唾罵當局而下獄，並於王世貞三十五歲時遭到處決。十年後，世貞之母亦喪亡。林教授認為，這段歷時多年、陰魂不散的家族悲劇，與《藝苑卮言》創作時段重疊，王世貞將父親罹難的遭遇投射於書中狂士的塑造。

王世貞的生命經歷，與其對落魄才子狂士的同情共感，不僅反映在對明初宋濂(1310-1381)之悲劇的體會，在其筆下，如祝允明(1461-1527)、張靈(生卒不詳)、唐寅(1470-1524)等人的任誕行為——形狂、心狂、不檢細行，也都透露出彰顯狂士奇行及其心理鬱悶。此外，該書也反映王世貞由典雅華麗的復古文風轉向「人格合轍的自我書寫」的趣尚，如他欣賞唐寅〈答文徵明書〉等表露性情之作，正符合他對落魄且不檢細行的才子評價：「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最後，林教授認為王世貞對奇人真情的偏好以及《藝苑卮言》的人物記錄，無疑是晚明真情流盪以及相關人物筆記的先聲。

與談人王鴻泰研究員從晚明的社會背景評價當時任誕與縱樂受到讚賞的原因。從體制層面來看，明代許多文人於科舉挫敗，而商品經濟發達，使他們得以遊蕩於城市並集會結社，在此背景下，王世貞等士人的文學評點活動，懷有收編文學集團，如廣七子、四十子等，重新編排、評價翰林苑外之狂士文學的意圖，狂士則於城市舞台追求曝光與獲利。

賀晏然教授以王世貞作為代表案例，說明晚明文人如何建立文人道教，探論文人道教的流行時間、參與者身分以及活動內涵。就概念而言，文人道教意指文人以私人身分參與道教相關活動的現象，而此類參與明顯有別於制度化官方道教的活動型態。然而王世貞以文人身分參與道教活動，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而能夠作為探討文人道教的案例？賀教授認為文人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所進行的書信往來、書籍出版與品鑑等，能夠作為有意義的視角以窺探王世貞之道教活動的特點。

明代皇室十分崇信道教，然而相對於皇室的熱衷，文人對道教則懷有許多的矛盾情感，如王世貞雖然研讀道經，但對官方道教頗有微詞。相對於北

方道教所具有的官方色彩，王世貞所處的晚明江南則充斥著不少為官方所排斥的教派。在此背景下，王世貞對非主流道士的推崇，反映他對於道教有不同於官方的理解。就宣教方式而言，文人參與道教相關活動，透過傳記、交流、品鑒、出版建立文學的傳播系統，展現不同於制度化道教的傳播形態。再者，文人宗教作為一種更加私人化的宗教信仰，大多以特定文人為中心的信徒圈流傳，提供私人感性、生活需要，因而較上層制度化信仰與下層民間信仰更顯封閉。此外，賀教授還指出三點文人道教的特點：對「奇」的文學趣味、佛道趣味的分離、文士生活的合流。賀教授以王世貞等人的曇陽子信仰為例，指出當時普遍接受曇陽子信仰的奇幻色彩，並以「奇」作為時人理解道教的進路。文人的道教信仰、修煉活動更表現在書畫、文學中，這些現象經由文本流傳，在地方上不斷地被重述。

與談人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賴思妤，指出官方道教與文人道教於儀式上具有許多重疊性，如王世貞以與西王母有關的弇州山為號，其活動空間亦取名弇山堂，表明王世貞的女仙情懷，此線索或能引導我們更進一步地探究官方道教與文人道教的關係。

三、專題演講二

發表人：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論 題：王弇州的明史著述與明史研究

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近年以《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之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等中朝史學著作聞名，在此之前，其《王世貞史學研究》一書便已全面介紹王世貞的史學理論、實踐及成就。

王世貞作為明代文壇領袖，更是明代史家第一人，雖因其未撰作紀傳體明史，而遭受明清及現代研究者的貶抑，但他在史料考辨、史書初稿等方面著述甚多，晚年所編《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實有不可忽略的價值。孫教授此次演講以史料彙編與筆記、史料考辨、史書初稿、晚年定

稿史學專著，以及他人編輯史學專著五大方面，介紹王世貞的史學成就。

關於王世貞的著作，在史料彙編與筆記方面，有《皇明明臣琬琰錄》、《瓠不瓠錄》、《國朝叢記》，以及當今不存的《天言匯錄》、《明野史匯》、《少陽叢談》、《弇山堂識小錄》等。在史料考辨方面，有原刊於萬曆五年（1577）的《史乘考誤》。王世貞十分注重的史書初稿類，如《錦衣志》、《北邊始末志》、《庚戌始末志》、《國朝公卿表》、《中官考》等十二考，皆收入《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稿》與《弇山堂別集》，並為後人收入《弇州史料》。王世貞晚年定稿的《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是其明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前書以「別集」而不以「史」為名，有兩個原因：一為模仿史記，變紀傳為「別集」；二則因撰寫明代國史的心願未了，故謙稱「別集」。後書是以內閣首輔為中心的專題史著作，為王世貞探討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書，揭示嘉靖、萬曆時期內閣政治的發展，描述首輔爭先贏得皇帝歡心的政治鬥爭。雖然王世貞處理當代史實有其主觀之處，但他仍持客觀心態以治史，這點難能可貴。而王世貞門人董復表（生卒不詳）編有《弇州史料》、黃美中（生卒不詳）刻印《鳳州筆記》，則是後人編輯王世貞史料的重要成果。

上述的各種書籍，皆是王世貞所留下的明代史料。王世貞崇拜司馬遷，本希望模仿《史記》以撰寫體例完備的紀傳體明史，雖未能完成，然從《弇州史料》或可推測王世貞原欲撰寫明史的內容及體系。此書前集三十卷的編排方式，對應志、傳、世家，分成序、考、志、世家、列傳等史書體例，董復表藉此還原王世貞撰作紀傳體明史的原初構想；後集七十卷收錄王世貞編修明史人物傳記、碑志銘文等重要史料筆記。歷來學者認為王世貞之所以未能撰成紀傳體明史的原因，主要是認為他缺乏史觀、體例創新、修史耐心等，然孫教授認為上述論斷皆無視王世貞始終以修史為己任，旁人亦目以國史的現象。王世貞晚年學道後，心態上從以修史為己任的雄心轉為慎重地「不憂人非，亦有鬼責」，這也是他最終未能撰成紀傳體明史的原因之一。

最後，孫教授總結王世貞的明史研究，認為他對明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足堪稱道，且幾乎涉獵萬曆前的諸多重大問題。孫教授對王世貞的史學成就歸結如下：一、注重制度史，如內閣、宦官、科舉、宗藩等明代制度，更是最早系統研究明代內閣制的史家。二、對於宦官專權、宗藩膨脹的研究：王

世貞有鑑於晚明宦官、宗藩帶來的弊病，因而展開詳細的考證，描繪當代宦官、朝臣輕重失衡的現象。三、關於明代政治、黨爭的研究：王世貞批判明代特務政治，詳盡考察諸廠與錦衣衛沿革，清理《太祖實錄》的不明之處。四、探討邊疆問題：面對明代南倭北虜的邊疆問題，王世貞透過考察哈密、安南等地，認為邊地失不足惜，警告當權者應該注意中土的重要性，為其史學與當代政治互動的例證。五、新掌故史料：內藤湖南（1866-1934）認為王世貞以野史為實錄的掌故學，後為焦竑（1540-1620）繼承，王、焦兩人改變過去以說部為主的方針，代之以吏牘、記錄為材料。歸納上述特點，孫教授認為王世貞的史學把握明朝總體特點，宣揚明朝正統地位，且反映他對於現實問題的關注，並以史學經世，展現他欲於明史研究上成一家之言的強烈心態。

在演講後的討論中，廖肇亨研究員補充王世貞對於韓國學界的影響。王世貞因弟子朱之蕃（1558-1626）的轉介，其人物形象、詩學理論對朝鮮有著龐大影響，且由朱之蕃轉述的王世貞軼事目前也僅見於朝鮮文獻中。此外，廖研究員亦論及中、韓學界關於「弇州晚年定論」的爭論。

四、第二場

主持人：林桂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藍弘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論 題：日本古文辭派眼中的王世貞

與談人：陳威璿（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劉家幸（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助理教授）

論 題：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及其在日本的影響

與談人：林桂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此場發表以王世貞的日本受容為主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藍弘岳以江戶時期對明代復古派的接受為題，指出相較於王世貞在中國的龐大影響力，其於日本則往往被與李攀龍並舉，且多以李攀龍為主；此外，王、李二人也常被用來襯托提倡古文辭派的荻生徂徠（1666-1728）。就日

本近世漢文學研究的狀況來看，王、李等人雖對日本復古派影響甚鉅，且往往被視為漢文學之日本受容的重要案例，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卻依循清儒觀點批判荻生徂徠與其接受的明代復古派僅是偽古典主義，並稱自己為最後的清朝人。荻生氏與吉川氏二人雖在觀點上有別，卻都表現出在強烈的日本身分認同下，以中國文化繼承者自任的野心。不論贊同或反對復古派，都不可忽視復古派在日本的流行，如中野三敏（1935-2019）認為江戶中期陽明學、黃檗宗、復古派等明代風潮盛行一時。江戶時期，那波師曾（1727-1789）所著《學問源流》即有詳細描述荻生徂徠如何接受王、李的復古思想，而在享保年間以前，至少有五十七種與王、李相關的古文辭派漢詩文集，及二十一種李攀龍所編《唐詩選》異本，尤其在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辭之前，如林羅山（1583-1657）等人，早已看重李攀龍《唐詩選》並以之為教科書。

從力倡古文辭之荻生徂徠的著作來看，可以發現明代復古主義對他的影響。他關於明代古文辭的相關著作，有《絕句解》、《絕句解拾遺》、《四家雋》等，惟其生前僅有《唐後詩》出版。《唐後詩》僅抄錄原詩，但為應付日本人的漢學程度，故作有《絕句解》一類的注釋之書。《絕句解辨書》透過以日文注解、解釋名物的方式，細緻地詮釋典故如何被運用。《四家雋》一書節選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李攀龍、王世貞文章，列出四家文章並加以註釋，其中明顯可見荻生徂徠排斥宋文的傾向。荻生徂徠之所以對王、李二人古文辭有所偏好，在於兩人為文專主修辭、敘事，不主議論，可藉以改變日本人學習宋文議論時的冗長、脆弱。在文學之外，荻生徂徠的經學觀點亦受李、王影響，他提倡古文辭並誓讀古書，強調不需朱熹等人註解，即能讀懂西漢以前的文章。荻生徂徠雖偏好李攀龍，但是他稱讚李攀龍時所使用的詞句，多因襲王世貞，並與王世貞文論意見大致相同。在荻生徂徠之後，其弟子服部南郭（1683-1759）多繼承荻生徂徠的文論，反倒他的另一位弟子太宰春臺（1680-1747）則批評李攀龍。藍弘岳研究員也指出，江戶時代編纂的王世貞作品主要分成詩文、尺牘，但尚未被全面地研究，其中，關於江戶時期的明代知識、書籍如何被接受等問題，仍有龐大的研究空間。

與談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陳威璿認為，若注意到荻生徂徠學派與王弼州之《易》學觀的差異，以及徂徠弟子太宰春臺對王世貞抱有

競爭意識等現象，可以發現在日本古文辭派對於王弇州的「接受」外，王世貞之日本受容還存在更多元的可能。

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助理教授劉家幸，以王世貞《世說新語補》與此書在日本接受史為主軸，探討日本江戶時期《世說》學的發展。關於《世說新語補》一書，王世貞自三十一歲開始刪定，到六十歲才由張文柱（生卒不詳）校注出版。王世貞對此書的熱愛，源於其家世瑯琊王氏，與《世說新語》中王導（276-339）等王氏的關係密切，也因他所處的吳中當時流行閱讀《世說新語》有關。

王世貞的《世說新語補》甫出版即獲得龐大迴響，此書在日本也影響甚鉅。自元祿七年（1694）至嘉永五年（1852）有十八部仿作作品傳入，而在十七、十八世紀不僅出版《世說》和刻本，箋注本、在地的和漢續做著作也相繼問世，更有《假名世說》等配有版畫、以日文詮解字詞的著作。此現象正反映了日本江戶時代《世說》學的盛況。此外，自《和漢世說故事苑》、《世說瑜案問答》等書的出版，也可見「世說」一詞在當時的普及程度，以及注解、舶載《世說》下降，日本當地仿作上升的情況。狄生徂萊的高弟服部南郭，為時人盛稱風流近似六朝人士，他所創作的《大東世語》，集結平安朝至鎌倉時期王宮貴族的嘉言，從其體例來看，在條目、敘事等處服膺《世說》體制、內容。此外，自空海受賜《世說》、林羅山家講學、擬作《世說》、徂徠學派的推動，至江戶幕府確立為日本官學等，皆可見《世說》自藏書、家學終至官學的接受演進，反映透過《世書》發揚摹唐風氣、文史的雅好，並以此為作文階梯、啟蒙教材的多種接受方式。再者，雖然《世說新語補》在日本影響甚大，然而明清追求古書原文的風氣，也同樣地影響岡井孝先（1702-1765）等人，提倡回歸《世說》原本。此些現象皆反映日本江戶時代《世說》學的盛況，以及《世書》在日本被接受的情形。

最後，劉教授以兩位日本出版《世說》作品的作者為例，說明《世說》如何在日本被接受與改寫。天和三年（1683）年，隱元隆琦（1692-1673）弟子、屬黃檗宗的南源性派（1631-1692）所作的《鑑古錄》，由石田茂兵衛（生卒不詳）刊行，現藏於日本東京的大正大學與駒澤大學。此書除了參照《世說》外，更仿明代雲棲株宏（1535-1615）《緇門崇行錄》與鄭瑄（約 1602-1646）《昨非庵日

纂》，目的為勸善教化，由此可見《世說》原書中的文學被改為清操，用以宣揚僧人應當清心寡慾，並對當時日本僧人因崇尚文字禪而與俗門交往過盛的情況作出勸戒。另一位原屬黃檗宗、後轉屬臨濟宗慈雲寺派的大典顯常（1719-1801），以參與外交、著述宏富聞名，曾著《世說鈔撮》四卷、《世說鈔撮補》二卷、《世說鈔撮集成》十卷、《世說匡謬》、《世說人氏世系圖》等多種世說學著作。與日本古文辭派交往密切的大典顯常，對於《世說》理解並不在以此書勸善教化，而是注重文字美感、語文學習以及補史等功能。透過以上兩個個案研究，劉教授歸納中日對後七子復古學派，以及日本以僧人為主的閱讀、箋注群體等異同。

與談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林桂如副教授指出，報告中以大庭脩（1927-2002）的書誌調查為主，僅能涵蓋江戶中後期的狀況，不能以此為江戶時代的共相。再者，晚明《世說新語補》實有王世貞與李卓吾（李贄，1527-1602）版本風行，日本和刻本對這兩者的接受如何，其中不論是文人或是僧侶的讀者視角，都有值得重新發現的受容過程。

五、第三場

主持人：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發表人：林佳儀（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論 題：《鳴鳳記》及其時代

與談人：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發表人：何炎泉（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研究員兼科長）

論 題：為何是王世貞？故宮 111 年度特展的選題與策劃：寫盡繁華——
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

與談人：林麗江（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

此場發表以王世貞相關的戲劇以及文化遺產為主題。林佳儀教授說明相傳為王世貞所作的《鳴鳳記》情節，並結合文字與實際演出闡述劇本大意。如今傳世的《鳴鳳記》共有明萬曆刻本、汲古閣原刻本、六十種曲本、清乾

隆內府抄本、清河郡黑格抄本，及咸豐、同治年間瑞鶴山房抄本等，然諸本並沒有標明《鳴鳳記》的作者，因此關於作者是誰，有王世貞、王世貞門人、隆慶萬曆年間無名氏、唐儀鳳（生卒年不詳）等四種說法。延保全認為《鳴鳳記》在創作、人物選擇以及相關事件上，都符合王世貞曲論標準、經歷。與延保全相反，劉致中則認為《鳴鳳記》中郭希顏（1509-1580）的形象與王世貞筆下人物不符。

除了考據《鳴鳳記》的作者問題，林教授亦針對該書重要情節進行說明。《鳴鳳記》之名出自第一齣〈家門大意〉中「朝陽丹鳳一齊鳴」。據張軍德考證，此劇本的刊行不早於萬曆元年，其中所言北虜、南倭等事，多符合史實，被視為明清時事劇的開山之作，然其中人物經歷多雜揉他人生平。關於劇中人物，該書以嚴嵩、夏言（1482-1548）為主，嚴、夏二人為同鄉、同僚，但對於是否收復河套立場對立。在人物塑造方面，該書極力描摹嚴嵩父子的貪婪，處處打壓夏言、楊繼盛等人。常見搬演於舞台的上卷以《斬楊》作結，罕見於舞台的下卷則以鄒應龍（1525-1588）等人彈劾嚴嵩的經緯為主。林教授亦播放崑劇演出片段，解說其中情節、人物關係以及舞台動作等。

與談人胡曉真研究員認為，林教授提及的時事劇概念很值得被發揮，一方面是至今《鳴鳳記》研究史少有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且以時事為名，創作時間橫跨嘉靖十數年，至萬曆才得以刊行的《鳴鳳記》，雖然時事劇中『時事』一詞帶有迫近的意味，然而此一性質卻能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範圍中被體認，其中的社會心態仍待探勘。

故宮博物院的何炎泉研究員介紹故宮將展出的王世貞特展，涵蓋策展理念、規劃以及展品等。何研究員指出，各博物館很少舉辦王世貞特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王世貞相關展件數量不足，難以具體呈現王世貞的特色。此外，王世貞雖在文學、史學、宗教各方面於晚明引領風潮，但他好談書藝卻不善書藝，書畫作品少，使得以往他的藝術評價往往隱於文徵明（1470-1559）與董其昌的盛名。

何研究員指出，此次王世貞特展主要有以下數項重點：一、全人養成與權威建立：以王世貞家族的書法為主，並結合其最有名的藝術成就，弇山園的相關畫作，展示王世貞相關文字，以及弇山園作為文藝中心的重要性。

二、收藏與典籍孕育出全方位的藝文史觀：王世貞的書法收藏量雖難以超越項元汴（1525-1590），但他的收藏中有珍稀藏品，如黃絹本蘭亭。此外，王世貞收藏眼光獨特，如他身處於流行元人文人畫的明代，卻特別重視南宋文人畫。王世貞會搜羅非典型藝術作品，傾心於非黃金時期的藝術創作，並詳細記錄作品的收藏史。在收藏之外，王世貞的藝術史觀，如其畫史五變說及其標誌祝允明、文徵明與王寵（1494-1533）為吳中書法三家，至今仍為畫史的重要觀察，可見其透過收藏、鑑賞培養的藝術品味。三、階級與區域多重競爭的盛況：此部分以比較王世貞與其他收藏家的藏品為主，從鑑賞風格角度、風格差異，說明王世貞與江南藏家之間的競合關係。四、創領風潮，定義繁華：以王世貞相關的《紀行圖》、水程圖、八仙、女仙信仰的藏品為主，說明他對當代與後世繪畫、宗教等領域的深遠影響。五、王子復仇與創造歷史：展示《鳴鳳記》、《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等王世貞相關文字作品。綜合上述展品，何研究員將王世貞定位為藝術團體的統籌角色，引領後世藝術收藏、贊助者爭相模仿。以雅好藝術聞名的乾隆（1711-1799）的許多行為，王世貞早已於晚明孤鳴先發。

與談人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林麗江，則期許透過此次特展，能重新認識王世貞作為收藏者、鑑藏家、藝術贊助者等多樣身分，並希望透過王世貞的各種題記提供的藝術收藏史資訊，深化我們對於十六世紀中國文化史的認識。

六、綜合座談

廖肇亨研究員談到晚明重要僧侶與王世貞多有來往，也提供晚明佛教復興的重要資訊，並認為以此次故宮展覽為契機，或能翻轉當今文學教育輕視復古派的風氣。廖研究員以鄭利華教授的演講為例，說明復古代表整體文化體系的重構，應當視為一種文化創新，而王世貞引領的復古風潮直貫整個晚明主流風潮，並與蘇州文苑、文化史關係密切，至今針對王世貞的毀譽，仍有許多研究空間。

王鴻泰研究員針對《鳴鳳記》與其時代，表示當時文藝活動是在城市商

業、北虜南倭的政治背景下進行，王世貞父子的軍事背景今日卻少有學者談及，如王世貞曾任職於擁有軍事權力的都察院，也當過兵備，這些經歷應是王世貞作為文士外，另一值得注意的身分。由此也才能理解，被後世視為奸臣的嚴嵩，實與當時邊境政策的爭論有關。最後，呂妙芬研究員感謝所有與會者的參與，並希望以後能以明代學會為平台，多多舉辦跨文學、歷史、藝術的跨領域對話和學術活動。